

充滿童真的發明家 ——悼念高錕校長

● 陳方正

在不少人心目中，科學家是不諳世故，帶點糊塗和滑稽的天才；發明家是精明、勤奮，知道自己要創造怎麼樣的世界，而且有眼光和百折不撓決心去達到目標的超人。科學家昂首天外，享受崇高聲望，卻不屑爭取人間名利；發明家腳踏實地，至終夢想成真，名利雙收。當然，這十九世紀的二元劃分早已過時：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科學家和發明家之間的界線日漸泯滅，到二十一世紀，仍然活在象牙塔中而自得其樂的，恐怕就只剩下一些數學家了。

不過，也有顯著例外，譬如名字和光纖通訊分不開的高錕。當然，發現光波在玻璃纖維中的衰減主要來自雜質散射效應是科學家分內之事；可是，意識到將玻璃纖維中的光波衰減度控制在每公里20分貝以下就有可能帶來長程通訊革命，和以高度純化的矽晶體為原材料就有可能製造出這樣的玻璃纖維，那卻是發明家的洞見；至於設計一個以激光與光纖為基礎的嶄新通訊體系，則要屬於工程師和工業家的範疇了。高錕在國際電話電報公司 (ITT) 屬下機構工作前後長達二十四年之久，他的貢獻橫跨了科學、發明和工業三個不同領域。他早年的科學發現為他在晚年贏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殊榮，可謂「名歸」，然而作為發明家和工業規劃家，他從ITT所得到的，只不過是高級工程師的報酬，那比起他在香港中文大學電子系一些同事創業所得，恐怕猶有不及，所以「實至」是無從談起的。這當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現象，但像他那樣聰明敏銳的人，卻好像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切身問題，那也是少有的。

1970年他初來中大聯合書院創辦電子系的時候，不但已經發現了光纖通訊原理，而且也到各地尋求過發展其應用的機會，卻仍然是一臉笑容可掬，無憂無求的童子軍模樣，既不擺架子也沒有機心，只是按部就班，老老實實地做他的系主任。不過，他又頗為耿直，有點駭人聽聞的一件軼事便是和一位高大倔強的工友發生衝突，幸虧同事勸解才沒有釀成事故。當時聯合書院屈處港島，房舍狹隘簡陋，理學院裏可謂雞犬相聞。其後我們遷於喬木，搬到沙田中大校園，但理科集中於科學館，所以仍然有不少來往。聽說他頗得

電子系同事尊敬，但要求很高，而且慣於當面作出評價，所以也不時出現尷尬局面。

無論如何，他此來只不過驚鴻一瞥，短短四年後便回到 ITT 去了。此去足足十四年，正好佔去他生命中精力最充沛旺盛的黃金年華。然而，將電訊速率提高千百萬倍的大發現，以及建立嶄新通訊體系，從而令人類交往方式起大革命的豐功偉業，當時為他換來的只不過是「行政科學家」的虛銜而已。我在 1987 年春到他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家中作客，這才意識到他在 ITT 的位置並不穩固，當年中大禮聘他出任校長，時機上是很適當的。

但很不幸，迎接他回到中大的，卻是一大堆剪不斷、理還亂的鉅變和矛盾，諸如天安門事件和香港回歸這兩件大事，還有中大學制和教職員退休金制度被迫作出根本改變的切身問題等等。由此引起的巨大焦慮、恐懼、憤懣、煩躁可想而知，學生不分青紅皂白，將這些情緒一股腦兒當眾發洩在和善木訥、不愠不火的校長身上，居然也還覺得是順理成章、天公地道。在如此巨大衝擊下，他表面上若無其事，仍然保持着童子軍般的陽光、開放和樂觀，但心靈所受創傷之鉅，恐怕是難以估量，更不足為外人道。

在 1989 年鉅變氣氛的影響下，我和金耀基、金觀濤、劉青峰等同事在當年年底開始籌辦《二十一世紀》。當時各地知識份子朋友的反應非常熱烈，但關鍵是資源。我們很自然地想到利用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力量，而且很幸運，從籌備至出版一直沒有遭遇甚麼阻力或者困難。很顯然，高錕校長在幕後的大力支持起了決定性作用。而且，在我們為創刊號舉辦的慶祝酒會上，他從幕後走到台前，不但很高興地來和我們一道慶祝，還即席發表講話，這給雜誌同仁帶來了極大鼓舞，也向大學同事們清楚表明了態度。此後將近三十年間《二十一世紀》雖然遭遇許多艱苦考驗，卻仍然能夠繼續發展和成長，追溯本，高校長當年的堅定支持和激勵無疑是決定性因素。而從後來的談話可以推知，他之所以願意支持這個事業絲毫沒有其他實際考慮，只是認為它本身在學術上、思想上有意義、有價值而已。回想起來，此事所涉及的資源對整個大學而言雖然微不足道，對於一位日理萬機，需要平衡各方利益，顧及各種不同校內外因素的領導而言，卻反映了無私判斷和承擔。不過，高錕向來是以童子軍眼睛看世界的，這也許反而不是甚麼為難的事情吧。

那時我剛剛搬到大埔居住不久，春秋麗日喜愛行山，高錕和他的夫人（熟人慣稱他們兩位為 Charles 和 Gwen）也有此好，所以也不時相約同行。記得去過九龍坑山和大刀屻山三四趟，但大家的體能稀鬆平常，都是到半山腰便停下來野餐聊天，觀賞風景，享受半日浮生閒情。時光荏苒，輕鬆愉快的日子總是如飛逝去。不知道為了甚麼緣故，高校長開始和同事乃至支持中大的某些元老不時出現摩擦，而且這慢慢變得嚴重，甚而導致令人面面相覷，難以圓場的局勢。所以在回歸前夕，度過耳順之年未久就退休，對他來說其實是難得的解放。擺脫了繁忙事務和無盡糾紛之後，他再度投入社會，迎來另一種人生：寫作、演講、創辦科技公司、主持國際學校等等，當然，還有接受



高錕校長出席2007年3月《二十一世紀》慶祝出刊百期的晚宴。(資料圖片)

作為「光纖之父」所應得的各種紛至沓來的榮譽——也就是步入人生如歌似畫的燦爛金秋了。

那段日子我們來往漸稀，但十載轉眼過去，令人不安的消息再度傳播開來。待得2007年3月《二十一世紀》慶祝出刊百期的晚宴上我們再次歡聚的時候，他好像已經來到生命的黃昏：和老朋友見面時雖然心情歡暢，但在台上講一兩句話也顯得十分吃力了。其實，那只是熱鬧場合中的緊張所致，真實情況還不那麼糟糕。過一年我和內人到他在跑馬地的寓所探望的時候，他仍然談笑自若，對行將遷回美國充滿了孩子般的興奮和期待，我們不覺黯然。

這以後發生的一切是大家熟知的故事了。畢竟上天沒有就此把他遺忘，在下一個金秋就為他送來了真正的、和他四十三年前大發現相稱的榮耀——令人惋惜的是，它來得晚了那麼一點點，剛好錯過了這位充滿童真的發明家和校長能夠把握它意義的最後時刻，因此只好把上台發表演說的光彩和重擔，交給了伴隨他一生，也盡心盡力照顧了他一生的Gwen。而且，這遲來的榮耀不但確立了他的歷史地位，也還有很大現實意義——因為這個機緣又把他帶回了中大和聯合書院，那畢竟還是愛護他，讓他可以安穩平靜地度過最後歲月的家。

兩三年前我們和耀基兄曾經不止一次邀請他們夫婦到沙田馬會寧靜的西餐廳午膳。他說話不多，但顯然很輕鬆愉快，竟然在餐廳周邊迴廊散步的時候吹起口哨來，曲調準確，節拍清晰明快，讓人想到一個無憂無慮、在山上遠足的童子軍。高錕你好好安息吧，帶着我們的懷念，還有全人類自知或不自知的感激。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